

少年犯罪防治之構想

高金桂

柒、專題討論(四)

一、引言

研討主題：少年犯罪社區防治之

構想

主持人：周主任震歐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引言人：高副教授金桂

(中央警官學校犯罪防治學系)

引言內容：

壹、前言

犯罪學之研究範疇，包括犯罪人、犯罪行為及犯罪現象，其目的價值則在犯罪預防及犯罪矯治方面之應用。就社會學的觀點而言，犯罪是一種社會事實 (social fact)，此種社會事實，必然是肇生於個人而存在於時空的脈絡之上。因此，探討犯罪現象，自可就時間架構做分析，亦可就空間架構做分析。本文之旨趣，即在空間架構上探討少年犯罪

之區位特徵，從而嘗試建構以社區為基礎之少年犯罪防治模式。

近代犯罪之集中於都市，乃世界各國共有之現象。由於對都市犯罪現象之興趣，使得一些犯罪學家及社會學家開始對犯罪與區域特性之關聯性着手研究。一九二〇年代起，芝加哥學派的犯罪社會學家，開始研究都市社會中之「少年犯罪區域」 (delinquency areas)，並逐步建構犯罪區位學理論 (ecological theory of criminology)。他們發現芝加哥少年犯罪有集中於某些特定地區之情形，而這些地區歷經數十年後，即使居民之組成分子已經改變很多，犯罪率依然偏高，且少年犯罪有集中於工商業區、房屋出租地帶 (尤其是低房租地區)、人口擁擠而流動性大之地區、缺乏社會福利機構或措施之地區、轉型區 (transformation area)、頹廢地區 (deteriorating area)。少年犯罪集中地區與成人犯罪及其他社會病態現象有相當高的一致性。犯罪學家所強調之區域特性，包括物理環境 (physical environment) 及社會環境 (social environment)；而犯罪空間，則包括犯罪人居住地或生長地 (即 breeding areas)，及犯罪行為發生地或犯罪誘發地區 (即 attracting area)。犯罪區位學之研究發展，使得往後在犯罪問題研究方面莫不重視都市化、區位類型 (ecological patterns)、社會環境、物理環境與犯罪之關係，也導致「芝加哥區域計畫」 (Chicago Area Project) 之產生 (註一)，嘗試在犯罪預防上建立一套新的模式。

貳、犯罪預防之意義

所謂犯罪預防 (Crime Prevention)，是指在犯罪未發生之前，吾人爲了減少或消除犯罪所採取之任何措施。根據傑佛利 (Jeffery, C.R.) 之看法，犯罪預防有下列幾個特徵：(1) 其措施必處於犯罪發生之前；(2) 其重點是在直接控制行爲，而非間接控制；(3) 其重點是在犯罪發生之環境，及有機體與環境間之互動，而非犯罪人本身；(4) 它是一種科學整合的工作，應兼容各種有關人類行爲之學科；(5) 它比懲罰及事後處遇在費用上較爲經濟，且較有效。(註一)

而犯罪預防之範圍，根據傑佛利之觀點，應包括下列五項：(註三)

(1) 物理環境設計之措施，如街道、公園、交通路線之終點站、住宅區、商業區……等，基本上這是建築學之問題，常涉及都市設計中物理空間之使用。

(2) 創造適用於潛在被害人 (potential victims) 及潛在犯罪人 (potential criminal) 之行爲改變模式，包括運用人民團體來預防犯罪及採用行爲改變技術和心理外科手術 (psycho-surgery) 來改變犯罪行爲及被害行爲，環境之設計不只用以預防犯罪，且應鼓勵健康行爲之發展，此應包括家庭環境、教育環境、鄰里環境之物理與行爲模式。

(3) 緊急與監控系統 (surveillance systems) 此類活動應涉及各種公私地區，通常是警察的任

務，但監控方法之使用應轉化到犯罪預防之各層面。

(4) 犯罪預防之經濟層面，例如使用經濟市場之力量來控制白領犯罪及組織性犯罪。換言之，可利用經濟制裁之力量來預防犯罪。

(5) 刑法本身應可經由除罪化 (decriminalization) 過程而成爲一種犯罪預防措施。

傳統上，吾人對犯罪之戰爭，曾經採用過兩種主要的理論取向，即嚇阻模式 (deterrence model) 與復健模式 (rehabilitation model)。所謂嚇阻模式，即在刑罰上就其嚴厲性 (severity)、速度 (celerity) 及明確性 (certainty) 做妥當之安排，並經由有效的刑罰追訴效能，以制裁犯罪人，使之不敢再犯 (即特殊嚇阻效果)；另一方面，經由對犯罪人之制裁所產生的示範作用，警告其他社會大眾及有犯罪傾向者，使其不敢犯罪 (即一般嚇阻效果)。所謂復健模式，即將犯罪行爲視爲一種疾病，並針對犯罪人之個別差異，提供多元化的處遇 (如不定期刑、保護管束、假釋、少年法庭、保安處分) 及矯治 (如心理治療、職業訓練、教育) 方式，使犯罪人能恢復正常，重新適應社會生活。

但嚇阻模式曾經歷失敗，最常見的是監禁處所太過擁擠，再犯率相當高，即是最嚴厲的死刑也未見有嚇阻犯罪之效果 (註四)。而復健模式亦曾面臨許多難題，如不定期之處遇所牽涉到之人權問題，高度的再犯率及接受矯治者日後所面臨的失業問題。此外，兩種模式都面臨另一個共同的困難：

由於相當高之犯罪數的存在，使其所處理的犯罪人只佔真正犯罪人之少部分而已，因此，即使犯罪矯治成功率高達百分之百 (事實上絕無可能)，其治療之效果仍屬有限。

因此，在一九六八年時，巴克 (Baker, J.D.) 曾在「一項執法科學與技術會議」上說，現有之刑事司法體系絕不可能解決犯罪問題，他說：(註五)

「很明顯的，單是改進現存之法院及矯治工作方法，並不能成功地減少犯罪，除非其所發揮之嚇阻效果確能減少從社會之新輸入 (即新的犯罪人) 並減少回饋的比率 (即再犯罪)。由於進入法院及矯治機構的人數，與進入整個刑事司法體系的人數比起來只佔少部分，這種嚇阻效果是難以合吾人之期待。爲了有效減少犯罪，我們的注意力必須集中在那些未曾被報案、被捕及被起訴的犯罪人。」

根據巴克的看法，即使我們將法院及矯治機構之效率提高到極限，仍無法大量減少犯罪。因而對於此一問題，邏輯上的選擇即減少犯罪人之輸入及司法處遇後之回饋率，即預防犯罪。換言之，犯罪預防應包括初犯預防及再犯預防，其內容顯比 Jeffery 所持見解 (只強調初犯預防) 更爲周延，筆者較爲贊同巴克之見解。

叁、都市犯罪之區位特徵

(一) 都市社會之特徵

都市社會具有某些特徵，如人口衆多、人口密度高、空間狹小、人口流動性大、人口異質性 (

heterogeneity) 高，這些特徵，均足以影響到實際關係及社會互動。

在都市生活中，居民面對着過度的刺激 (overstimulation)，在負荷過度之環境 (overloaded environment) 裏，經常面臨大量的刺激輸入，常超越了其認知處理能力之範圍，因而可能發展某些適應方式 (註六)；在這種情形下，都市居民對很多事情均不願加以理會，且除非涉及本人，通常不願涉入他人之危機，即使面對犯罪案件亦復如此，甚至旁觀者愈多，愈沒有人願意排解危機，也使警方反應速度慢了很多。而都市之高人口密度，也會影響到人類的心理品質及攻擊性行為之發生，此乃肇因於個人空間 (personal space) 之受到破壞。

由於都市社會高度的人口流動性及人口異質性，造成居民之間的匿名性 (anonymity)，導致「不涉入規範」(norms of noninvolvement) 之產生，他們不相信陌生人，尋求隱匿，從社會接觸中退縮。在社會結構上，形成「主動退縮徵狀」(autonomy-withdrawal syndrome)，避免自己與他人建立任何親密之接觸。此種人際關係及社會結構之現象，導致都市非正式社會控制力之降低，促成有利於犯罪發生及犯罪人行動自由之結果。(註七)

(二) 犯罪區位學之研究

蕭氏與馬凱 (Shaw & McKay) 採區位學方法，分析芝加哥少年犯罪與社區發展或變遷過程、社區物理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他社區病理現象之間的關係。在研究都市成長和都市擴充過程上，他們

仔細分析城中心工商業地帶向外發展之過程、頹廢建築物之分布、人口之增減、貧戶分布、房租之高地、黑人及外國移民之分布，並在時間架構上說明各項變因之動態發展過程，以爲少年犯罪分析之基礎資料。

蕭氏與馬凱探討少年犯罪區域，係取自芝加哥少年法庭之少年犯罪資料，分別包括一九〇〇—一九〇六年，一九一七—一九二三年，一九二七—一九三三年，他們發現歷經三十年之變遷，少年犯一直密集在中心商業區周圍之地帶；其後他們進一步運用一九三四—一九四〇年的少年犯罪資料製作犯罪基圖，發現少年犯住所分布與前大致相同，其主要發現可歸納如下：(註八)

1. 在芝加哥不同地區之間 (分爲一一三個地區)，逃學率、少年犯罪率、成人犯罪率有明顯的差異。

2. 離市中心愈近之地區，少年犯罪率愈高。

3. 逃學行為、成人犯罪、少年犯罪在居住地之分布上有明顯的一致性。

4. 逃學率、少年犯罪率、成人犯罪率之差異性充分反應社區之不同背景，高犯罪率之地區具有物理環境頹廢、人口減少、住宅擁擠、房屋自有率低、房租低廉、人口流動性大、種族複雜及其他社會解組現象。

5. 少年犯罪率與逃學率、嬰兒死亡率、肺病流行率、心理疾病流行率均有顯著之正相關，換言之，少年犯罪率與地區之社經水準有關。

蕭氏與馬凱之研究，激起其他國家之犯罪學者

嘗試運用區位模式來分析少年犯罪問題。一九七〇年，南斯拉夫學者托克羅維希 (Toderovich, A.) 在其所提論文中，發表了對貝爾格勒市的研究結果，發現少年犯罪地帶有明顯的社會負面因素，特別是違章建築多，住宅空間狹小、缺乏活動場所；有社會不穩定因素，如離婚率高、失業率高、人口流動性大；也有明顯的社會病態因素，如娼妓、賭博、酒精中毒、成人犯罪率均較嚴重。(註九)

Shaw 與 McKay 係針對少年犯之居住地分析犯罪之區位分布，因此係將人文區位學轉化到犯罪人之研究，而非犯罪發生地之研究。他們研究之缺點，在於忽略犯罪行為地，且亦忽略了犯罪發生之物理狀態，因而其所研究之環境，係以社會環境爲主，而對物理環境則不甚關心。也正因爲此種研究上之着眼點，Shaw 與 McKay 認爲少年犯罪乃勢微之轉型區 (decaying transition neighborhood) 的產物，強調其中之社會解組及文化衝突現象，且經由幫派而世代相傳，成爲「文化傳遞」(cultural transmission) 之現象。

爲了建構更完整的犯罪區位學研究模式及理論體系，新近的人文區位學者喬治沙比 (Daniel E. Georges-Abejye) 認爲犯罪是一種「社會及空間上的實體」(social as well as spatial reality)，而犯罪區位學之研究必須考慮下列因素：(註十)

P 因素：(1) 犯罪案件發生地

(2) 犯罪人居住地

(3) 被害人居住地

(4) 犯罪人被捕之地點或處所

C 因素：指犯罪事件之社會組織 (social organization)；例如被害人與犯罪人之關係如何？犯罪人所使用之武器為何？

E 因素：指犯罪事實發生時，其周圍之有機和無機的物理環境；例如被害地點是在室內或街上？犯罪是否發生於貧民區。

T 因素：指犯罪事實發生之時間，其他如嫌犯被捕之時間、犯罪發生後警方之反應速度等，亦應包括在內。

(三) 物理環境與犯罪

傳統上，犯罪區位學之研究大致強調社會環境，而忽略了物理環境之重要性；但於探討犯罪行為地時，物理環境是一項不可忽視的因素，其重要性甚且超過社會環境。波格斯 (Boggs, S. L.) 之研究即發現，犯罪行為地與犯罪人居住地是有差異的，而此種差異性又因犯罪類型之不同而異。因此，英國內政部在研究倫敦市之公車破壞行為之研究報告中曾提出這樣的結論：「若犯罪學家想要發展一套有效的減少犯罪之技術，則從物理環境着手設計將比社會環境更有價值。」(註十一)

安吉爾 (Angel, S.) 在一九六八年之一篇報告中，論及都市計畫與犯罪預防，他認為犯罪發生率與社會環境、物理環境、領域性 (territoriality)、開放性 (accessibility) 及被害人之行為有關係；而視野、監控效果、社區知覺行為皆是嚇阻犯罪

之力量，他並曾就地區使用之頻率與監控效果之關係說明犯罪發生之可能性。(註十二)

紐曼 (Newman, O.) 在其所著「防衛空間」(Defensible Space) 一書中，亦就紐約市探討建築設計與犯罪之關係。他認為防衛空間應包含領域性、監控系統、意象 (image) 及安全地帶 (safe zones) 四個層次。其說明如後：(1) 半私有空間及私有空間 (semi-private and private space) 由於易形成個人之歸屬感或擁有感，因此比公共空間更具有防衛之可能性；(2) 諸如街道及公園之類的地區，若從住宅望之，可見度愈高，則監控效果愈佳，而安全性也愈高，反之則成為危險地帶；(3) 住宅設計若與其他建築物、公園、街道相隔離，則愈易產生負面意象 (negative image) 而危險性也提高。(註十三) 此外，達夫拉 (Duffala, D.C.) 曾研究一些常遭強盜之雜貨店，發現有四個變因與其被害之可能性有關：(1) 與主要交通路線接近所形成之有利的逃生路線；(2) 交通流量少，形成與監控系統之疏離；(3) 土地利用之型式、住宅位置、空地分布狀態；(4) 附近缺乏商業活動之地區。(註十四)

肆、臺北市少年犯罪社區防治之

研究

民國七十二年，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及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合作辦理「少年犯罪社區防治之研究」，委託周震歐教授主持，

筆者亦參與該項研究計畫。根據該項研究結果顯示，臺北市少年犯罪行為地及少年犯居住地，在地理區分布上的確有不均勻之情形，且在某些地區（自然區）有明顯之密集現象，此種密集現象在少年犯居住地方面又比少年犯罪行為地更為明顯。(註十五)

(一) 犯罪行為地之區位特徵

在物理環境上，通常顯得雜亂，巷道狹小而不規則、違建多、視野狀況不佳、來往行人密度高。在社會或人文環境方面，顯示居民社經水準偏低，對子女教育能力較差、代溝嚴重；地下工廠多，移進人口較多，居民組成分子複雜，社區異質性明顯；也有些地區，因充滿遊樂場所及物質誘因，吸引大量青少年前往活動，而社區人際關係疏淡，致非正式社會控制力薄弱。

在社會病理因素方面，此等社區內顯示有較多之幫派及街角青少年；色情場所多；酗酒問題嚴重；出租房屋或套房較多，而致出入分子複雜。

(二) 少年犯居住地之區位特徵

在物理環境上顯示有下列現象：(1) 違章建築多，街道狹窄而不規則；(2) 缺乏公園綠地類之活動場所；(3) 老舊眷舍與新建高樓成明顯對立；(4) 小廟或神壇多，也常成為青少年聚會場所；(5) 一般家庭住宅面積狹小。

在社會或人文環境方面：(1) 具有大量之外來移入人口，人口異質性及人口流動性高；(2) 社經水準偏低，有些地區甚至有貧窮文化區之現象；(3) 父母對子女管教能力較差或管教不週；(4) 社區居民異質

性高；(5)家庭凝聚力弱，組成分子複雜（如同父異母、同母異父、老夫少妻）。

在社會病理因素或社會不穩定因素方面：(1)酗酒及酒後滋事多；(2)離婚及失業賦閒者多；(3)賭博；(4)青少年街角幫派多，常從事一些偏差行為；(5)廟會活動多，常吸引青少年參加，甚至逃學。

(二)少年犯罪行為地與居住地之關係

由於犯罪行為地與居住地在某些社區顯示有相當之一致性，使得此兩種地區在某些環境特徵上顯得很接近。

此外，研究結果顯示，少年犯罪行為地與居住地之異同與犯罪類型有關。違反道德秩序之犯罪，此兩種地區之差異性最大，其次為對財物之犯罪，再次為對人身之犯罪。顯示對人身之犯罪，因常係犯罪人與被害人有所衝突而引起，而衝突則常因其間有某些互動關係所引起，因此在距離上較為接近。

伍、由環境設計預防少年犯罪

犯罪區位學之研究，在犯罪學及社會政策上最大之啓示即引起「由環境設計預防少年犯罪」(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 簡稱CPTED)之運動。而在從事環境設計時，吾人須就少年犯罪行為地及居住地分別考慮，而環境類型，則應兼顧到物理環境及社會環境。

(一)都市計畫及都市更新應考慮犯罪預防觀點
在都市設計及社區規劃上，應避免將遊樂區過

度集中，而新建建築物及道路與空間之設計，盡可能擴大視野，提高監控效果，使具有犯罪意圖者知覺到犯罪之危險性而避免犯罪之發生。而新社區規劃及舊社區之整建，均應考慮到犯罪預防，設法使公用地區具有私有或半私有之感覺，提高居民之互動關係及其對公共地區之責任感與介入危機之意願，以預防犯罪之發生。

在少年犯罪居住地方面，其物理環境顯示遠建多，住宅空間狹小，且附近缺乏足夠之公園綠地類的空間供其活動，致家庭凝聚力及社區凝聚力均受到不利影響，故今後新社區規劃及舊社區之整建，必須充分預留公園綠地及運動場所，並充實休閒活動設備，避免青少年流向充滿物質誘因與衝突機會之遊樂場所。

(二)消除社區不穩定因素

少年犯罪居住地，顯示有較高的失業率、社經水準低落、家庭結構功能缺損、流動人口過多等現象，故對此等地區應加強軟體建設，推行此等區域內之就業輔導工作及小康計畫，運用社會工作方法改善其家庭關係及功能，並強化戶口查察工作。換言之，對具有犯罪危險性之少年，其輔導及預防工作不能僅止於少年本身，應擴及整個家庭甚至社區，以建立合乎少年人格及行為發展之環境條件。

(三)消除社會病理因素

少年犯罪行為地，有明顯的色情誘因，再加以色情黃牛之活動，對青少年身心造成嚴重之影響，且直接或間接引發許多衝突與犯罪。故對於色情問題之對策，實有重加檢討之必要；若能有效禁絕自

應最好，若無法禁絕，則應考慮容許其存在之地區及方式。

(四)針對特殊化之社區結構擬訂社會工作重點

例如新建之社區，居民因新遷入，彼此匿名度高，也缺乏社區意識，再加以空屋多，常成為犯罪人潛伏及犯罪發生之處所。針對此種社區，政府公共行政部門應迅速配合其發展而新設單位或擴大編制，以應社區之需要，並舉辦社區活動，輔導設立守望相助組織，以增進社區意識，預防犯罪。在這方面，政府應採取主動之作爲。

(五)加強社區處遇工作以預防再犯

相對於機構性處遇，社區處遇 (community-based treatment) 係輔導少年於社區內，使其接受各種專業輔導及矯治服務，以改變其態度與行為；俾免其從社區中孤離而再度發生適應困難的問題，亦可免受標籤之不良效應。

對於接受保護管束之處分者，及經犯罪矯治機構或感化教育機構處遇後返回社區者，應動員社區內所有犯罪防治有關之人力及資源，有計畫地提供專業性輔導服務，使其能與犯罪絕緣。

(六)加強警察單位之巡邏查察以預防犯罪

針對少年犯罪行為地及監控效果較差之地區，警察單位可列為巡邏勤務之重點，以嚇阻犯罪之發生。而對少年犯罪居住地，則宜加強戶口查察工作，充分掌握流動人口之動態，並可藉此加強警民關係，宣導犯罪預防之觀念。此外，警察單位亦可研究編印犯罪預防手冊，供社區民衆參閱，以提昇居民犯罪預防思想與行動之層次。

附 註

註 一：芝加哥區域計畫係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期由

於蕭氏 (Shaw, Clifford R.) 及馬凱 (McKay, Henry D.) 之推動而創立。蕭氏及馬凱發現芝加哥某些地區歷經時間及人口上之變遷，一直仍為犯罪嚴重之地區，他們將此種現象歸因於文化傳遞 (cultural transmission)。在這些地區內犯罪與少年犯罪成為正常的、傳統的社會活動之一部分，並且由於個人與團體 (鄰里關係) 之接觸結合，犯罪成為文化傳遞之價值與標準；此種次文化一旦形成，其價值、規範、行為偏好將透過新世代之社會化而世代相傳。因而在高少年犯罪率之地區，通常有貧民區之現象，有更高的成人犯罪率，且大多數的犯罪與幫派 (gangs) 有關係。區域計畫之目的即在為此種地區提供少年犯處遇及少年犯罪預防之服務，經由社會工作之方法，鼓勵居民自動配合青少年福利計畫，提供其必要之設施與專業之輔導，以改變其社會環境之不利因素，達成防治少年犯罪之目的。

參見 Charles W. Thomas & John R. Hepburn *Crime,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Dubuque, Iowa: W.M. C, Brown Company Publishers, 1983,

p. 207.

另見 Martin R. Haskell & Lewis Yablonsky: *Crime and Delinquency* (3rd. ed.). Chicago: Rand McNally College Publishing, 1978, pp. 503-504.

註 二：C. Ray Jeffery: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 mental Desig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77, p. 37.

註 三：Ibid, pp.45-46.

註 四：如 Archer 及 Gartner 等即曾就死刑對殺人犯罪之影響，他們曾蒐集了十四個國家及城市之犯罪資料，探討死刑廢止後殺人犯罪率之增減情形，認為死刑對犯罪無任何顯著的效果，在十四個國家地區中，廢止死刑後，大多數殺人犯罪反而減少。見 Dane Archer, Rosemary Gartner, and Marc Beitel: *Homicide and the Death Penalty: A Cross-national Test of a Deterrence Hypothesis*. In "Th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Vol. 74, No. 3, 1983).

註 五：C. Ray Jeffery, op. cit., p.34.

註 六：(1)對個別輸入之刺激少分攤時間；(2)忽視或不理會不重要之輸入；(3)在社會交易或交往上儘量將責任推諸他人；(4)阻擋刺激輸入之途徑 (如電話簿上不署名，夜間將電話拿上)；(5)篩濾過強的外界輸入，

只容許與他人建立片面或薄弱之關係。郭文雄撰「都市社會生活之一般型態」，見蔡勇美等主編「都市社會發展之研究」(三版)。臺北：巨流圖書公司，民六十七年，頁四二—四三。

註 七：都市非正式社會控制力之薄弱，主要與高人口流動性及居民對犯罪威脅之恐懼感有關，與人口密度及社區大小並無必然之關聯性，因此史瓦茲 (Schwartz) 於一九六九年在研究以色列農莊之非正式社會控制力後下了結論：「決定社區非正式社會控制力程度的是社會互動 (social interaction) 及社會關係 (social relationships) 之結構，而非社區之大小。」換言之，非正式社會控制力與社區之整合力有關。基於此種觀點，顯見都市社會若經良好設計，仍能有效控制犯罪。

見 John E. Conklin: *The Impact of Crime*.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1975, pp. 137-140.

註 八：Harwin L. Voss & David M. Petersen (ed.): *Ecology, Crime, and Delinquency*. New York: Cerdith Corporation, 1971, pp. 2-3 & p.71.

Clifford R. Shaw & Henry D. McKay, *Juvenile Delinquency and Urban Area* (revised 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pp. 10-11.

註九：胡夢鯨譯「都市少年犯罪的區位模型分析

——貝爾格勒市研究實例」，文刊「刑事法雜誌」（二十七卷一期），民七十二年，頁九四—九九。

註十：Daniel E. Georges-Abejic: "Studying Black Crime: A Realistic Approach". In Paul J. Brantingham & Patricia L. Brantingham (edited): Environmental Criminolog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81, pp. 99-100.

註十一：C. Ray Jeffery, op. cit., p. 190 & p. 206.

註十二：Ibid., p. 191.

註十三：Ibid., pp. 192-193.

註十四：Ibid., p. 205.

註十五：見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及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出版「少年犯罪社區防治之研究」。民七十四年，臺北。

二、討論

許主任春金發言：

剛才高副教授提到犯罪人經常是一個有理性的人，犯罪不是一個無理性的現象，那麼為什麼他們還是去犯罪？

謝高橋教授發言：

良好的都市設計可以減少犯罪是不容置疑的，但應考慮人類社區活動在內，而戶口普查跟環境設計應無多大關連，芝加哥都市區位的研究，認為都市郊區犯罪率較高，但郊區也正隨都市化而增加其犯罪；根據我的區位學研究資料，高雄市商業金融區與犯罪發生具有密切關係，而跟住宅區、工業區，並未發現彼此之關係存在。

林山田教授發言：

我們是否能在都市計畫立法中介入更多的影響力，我發現理論上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認識；我有一個不成熟的看法，就是在整個環境設計對犯罪防治具有相當功效，問題就是目前都市計畫任由建築商亂蓋，我們所談都是落空，也必然驅使青少年走向犯罪之途，故個人就所住民生社區為例，民生社區本是一個很好的社區，圓環附近也原本規劃有很好的公園預定地，但經過土地使用變更，目前已由財團蓋了十六層大樓，我希望本次研討會能發生一點功能，盡量在都市計畫立法方面能介入參與，否則再好的理論也無從發揮其功能。

高金桂教授答覆：

第一點，關於犯罪人有理性，為什麼會犯罪，我所談的並非全部，而是大部分屬於理性，如因精

神異常或精神生理的病變則是非理性的，除此之外，大部分的犯罪都是理性的，因他們都知道在犯罪有利與不利間加以斟酌。如一位法官問竊盜犯，他坦誠告訴法官偷竊被捕的機率很小，警察破案率也低，萬一被捕被判刑期也短，算一算目前國民所得，偷竊還是值得從事的行業，我認為這是相當理性的犯罪。當然他們也考慮到機會，如被害對象是女人、老年、小孩，則較易得手等也是。

第二個問題是謝教授談到郊區的犯罪率有愈來愈高傾向，我個人非常贊成，在低度使用地區，因缺乏足夠犯罪的被害人，也缺乏足夠的犯罪誘因，因此在這個地區犯罪的可能性應是較低，譬如中央山脈，應沒有強盜會跑到中央山脈去犯罪吧！而在高度使用地區，由於變遷發展快速，人口大量遷入，人口異質性也較明顯，這些地區非正式的控制力較低，目前臺灣地區的犯罪統計資料雖然顯現都市犯罪較嚴重，但很可能是都市警政犯罪紀錄健全，使人感覺犯罪較多，不爭的事實是，臺北近郊的犯罪情況實較臺北市區來得嚴重。

至於物理環境的設計應考慮到社會的互動，我也非常贊成，因環境本身就應包括硬體及軟體設施在內；而戶口普查畢竟是制度下的產物，從加強戶口管制是否也是屬於環境規劃的一種，是不是這樣，敬請指教。

財物犯罪與商業區高度相關是必然的。林教授所談的介入都市計畫立法方面，我也非常贊同，不知在座各位是否有機會能將此意見反應給上級，謝謝各位！！